

# 以笔代枪为和平

——再读丰子恺《大树画册》

◎宋生贵



翻开丰子恺的《大树画册》，我们看到其中的作品集中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很强。由此，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原本“雍容恬静”“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于‘清’字之外又加上一个‘和’字”的丰子恺，竟然亦有一个战士的意志与力量。这是他的大爱境界及悲悯情怀在特定时期的表现。

丰子恺早年憧憬的生活是：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人，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然而，日寇入侵，“蛮夷猾夏”，他的美好憧憬被战火所破灭。原本满怀护生戒杀慈悲之心的他义愤地呐喊：“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对抗暴敌。”（《还我缘缘堂》）“古语云：‘众志成城’。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爱护同胞》）自此，他便以笔为枪，开始了一个爱国艺术家的抗战作为。

《大树画册》是丰子恺客居广西宜州时创作的。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曾在1937年，丰子恺写下了“宁当流浪汉，不做亡国奴”的立心之言，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艺术抗日之旅。1939年，他在《宇宙风》上发表《艺术必能建国》，认为道德与艺术殊途同归，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更应大力提倡艺术，坚信“艺术必能救国”。他在大声疾呼的同时，身体力行之。他胸怀祖国大地，心系受难同胞，在“艺术逃难”的过程中，一路走，一路记，一路画，将自己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感的东西呈现于画笔之下。丰子恺在《大树画册·自序》中写道：“迺者，蛮夷猾夏，畜道横行禹域，惨状遍布于神州，触目惊心，不能自己，遂发为绘画，名曰大树。”该画册1940年2月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成为抗战时期美术界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一曲高亢的战歌！

《大树画册》中的第一幅作品，画的是一棵大树遭遇砍伐，但它仍然在根植大地的那段树桩四周长出许多新枝，昭示其不屈的生命力。画幅右上侧题诗道：“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怨抽条，气象何蓬勃！”以大树而写心志，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

《大树画册》中的作品表现的全部是抗战见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及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伤害，如《轰炸——嘉兴所见》《轰炸——广州所见》《轰炸——武昌所见》。其笔墨中传达出对侵略者“畜道横行”的“不能自己”的愤慨；表现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抗战精神，如《马上抬头看，空军杀敌归》《青天白日下，到处可为乡》《失地中的儿童》《看壁报》《簪食壶浆》《源源不绝》《生机》等；表现因战争所迫而逃难在



外的人们的思乡之情，如《为念流离苦，停杯不能食》《为念战争苦，好景忽减色》等；表达抗战获胜，迎接和平的美好愿望。

《生机》这幅漫画创作于1938年，当时，丰子恺携一家老小迁往长沙等地，但他以一个“醒着的战士”的自觉面对抗战，以画写志，表达生机不息，希望可期。他在散文《生机》中讲：“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如此。”

画册中表达抗战胜利，迎接和平的美好愿望的作品所占比例最多，如《我愿化天使，空中收炸弹》《凯归》《解战袍》《胜境在望》《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战场之春》《炮弹作花瓶》等。由此可见丰子恺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以及对和平的渴望。

丰子恺讲，有一次，他去访问一位医生朋友，看见朋友书房的案上摆着一瓶莲花。花瓶的样子很别致，仔细一看，原来是个一尺多长的炮弹壳，他大为吃惊，同时“又如获至宝”。“因为这别致的形象也含有丰富深刻的意义，也是我作画的模特儿。用慷慨激昂的演说来拥护和平，远不如默默地画出这瓶莲花来得动人。”于是便有了《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这幅取材别致、立意不凡的佳作。一向谦逊的丰子恺自己称之为“我又有一幅得意之作”。这幅《炮弹作花瓶》也是作于1938年，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期盼之情。

经过抗日战争那特殊岁月的洗礼，丰子恺的漫画创作与散文创作都发生了变化。就《大树画册》中的作品而言，颇有战场速写的特征，即激情饱满，洞察敏锐，有感即发，一挥而就。较之于他之前及之后的漫画，这些作品更显得下笔果断有力，着墨浓重淋漓。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经历以及“不能自己”的创作冲动。

丰子恺是有力量的，深刻的，且依然是风趣的，幽默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从本性中热爱和平的他格外兴奋。他在散文《胜利还乡记》中写道：“我带了六个孩子（二男四女）逃出去，带回来时变成了六个成人，又添了一个八岁的抗战儿子。倘使缘缘堂存在，它当日放出六个小的，今朝收进六个大的，又加一个小的利息，这笔生意着实不错！它应该大开正门，欢迎我们这一集人的归来。”该文的前半部分，丰子恺回忆了在抗日战争中，不仅他的家乡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的残酷破坏（包括他亲自设计、用心而又倾力建造的缘缘堂被敌机炸毁），而且他的姑母在那场劫难中去世。归乡后，面对蔓草荒烟里的缘缘堂废墟，他彼时彼刻的愤怒心情可想而知。可是，他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转换笔锋，写下了以上这段文字，以别致的方式表达他和他的家人虽然历经战乱之苦，但如今更为抗日战争胜利的战果而振奋，为走向和平的大势而欢欣！

再次静读丰子恺的《大树画册》，对我心灵深处的最大触动是：珍惜和平与安宁是所有正直善良的人的心愿，而且有理有信，这心愿是一种人世间的永恒！



“自作多情好。比期待他者多情好太多。人生在世，要善于对自己自作多情。”翻开池莉的散文集《人生在世，自作多情》，就像推开一扇通往武汉街巷的木门，热干面的芝麻酱香、江滩的晚风、菜薹的清甜顿时扑面而来。作为湖北人，这些味道刻在基因里，成为我们与故乡之间最柔软的纽带。

池莉用数十年光阴，将市井烟火熬成文字，让平凡日子焕发出诗意的光芒。她笔下的武汉，没有宏大叙事，只有触手可温的生活细节。写热干面，她直言：“什么加鳝鱼、牛蛙，都是万万使不得的！当堂煲好就吃，专心致志，埋头苦干，好比陷入热恋——这才是应有的态度。”写菜薹则如写一位高洁的故人：“随采随吃最妙，冰冻即坏，隔天就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文字让我想起小时候，清晨巷口的面摊氤氲着热气，老板顺手多撒的一把葱花就能让整碗面生动起来；冬日里，母亲从霜打过的菜地掐回紫红的菜薹，简单清炒便甜润满口——这就是池莉所说的“甜津了”，是舌尖上的乡愁，更是生活最本真的滋味。

池莉将“自作多情”淬炼成一种生活智慧。她在书中坦言：“我给武汉的，是懵懂狂妄的青春、焦虑烦躁的中年；倒是这座城市给了我太多太多。”这种对栖身之地的深情，何尝不是每个异乡人的情感良药？我在外地求学那些年，每逢寒冬就会想念家里土灶煨的排骨藕汤。池莉一句“凛冬将至要不要喝碗排骨藕汤”，不只是询问，更是一种温暖的召唤——召唤我们以主人的姿态拥抱当下，而非过客般疏离地活着。

书中对幸福的理解尤其令人动容。封城期间，她绕路几小时只为看长江：“面红耳赤灌下一瓶凉白开，丢掉了烦恼，心也宽了。”这让我想起2020年隔离时，邻居在阳台上敲着饭盒唱起《洪湖水浪打浪》。池莉说得真切：“幸福不是远方的星晨，是当下捧稳一碗汤的温度。”武汉人的泼辣与柔韧，就藏在这份对生活琐碎的热烈深情中：鸭脖本是边角料，吉庆街的小贩偏要把它卤成传奇；热干面不过是碱水面拌酱，却值得食客“如热恋般专注”地去品味。

《人生在世，自作多情》最动人之处，在于让平凡日子有了诗的重量。她说江滩是“大城市的森林”，打水漂时“逼看青蛙截不动许多愁”，东湖的烟波便成了治愈心灵的良药。作为湖北人，我忽然懂得：所谓故乡，从来不是地理标签，而是以自作多情的方式活着——对一碗面倾心，对一条江感恩，在生活的褶皱里触摸到生命的敦实与温暖。

池莉在书末写道：“人生三万天，活就要活个磊磊落落！”这何尝不是对每个现代人的温柔提醒？当世界催促我们不停奔跑时，她笑吟吟地告诉我们：且慢，先对脚下的土地、手边的日子，多情一回。因为人间至味，从来都在自作多情处。

## 在生活的褶皱里触摸生命的敦实与温暖

——读池莉散文集《人生在世，自作多情》

徐晨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可见，起源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爬山调是“中国民歌中山歌类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及河北张家口地区……在这一带蒙汉杂居区的爬山调中又常含有蒙古族民歌的音调。”而武川县，正是处于这一杂居带，爬山调在此非常流行。2008年，爬山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但是，以爬山调代表性的传统曲调，如《割莜麦》《大黑牛耕地犁翻土》《小青马》《想老子》等为主基调，整合原创的120分钟的舞台大戏，却非常鲜见。

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横跨阴山南北，拥有多个历史时期长城遗址的武川县倾力推出抗战题材爬山调舞台剧《青山儿女》，既是“不忘历史，继续前进”的宣誓，也是在思想情感辩证中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更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笃定意志，有效地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爬山调。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具有持续生长创新的发展性，以及具有符合人类共同需要的审美性。《青山儿女》的唱腔，均是在传承爬山调旋律高亢悠长、节奏自由奔放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的。而唱词，也是在继承爬山调乡土气息浓厚、唱词短小精干、重叠使用虚词的基础上，以“内容为王”的。

抗日战争，属于政治领域；男女爱情，属于道德范畴。《青山儿女》贯穿性的戏剧冲突，就在于抗日与降日的矛盾，以及母女嫁谁、不嫁谁的矛盾。前者是政治立场和反侵略斗争，后者是民间烟火和饮食男女，二者的水乳交融，引导观众在感受中感动，在感动中感悟，最终扪心自问：凡德助者必然坚决抗日？凡缺德者大多会做汉奸？这是关涉人性与人心的大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德行是立场的基础，正确的立场又能促进人们对高尚德行的敬仰和学习。而这部爬山调抗日历史剧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之处，就在于此——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唱念做打，是舞台剧的四大组成部分，这部戏却是近乎歌剧以唱为主的。剧情伊始，阴山山脉深处得胜沟的抗日

## 爬山调攀上新高峰

——评武川县乌兰牧骑爬山调抗战历史剧《青山儿女》

◎李树榕

“堡垒户”云岚和山丹母女俩，正面临着饿死的危险。戏剧冲突的悬念，随着她们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不断向人的情感和思想深处推进。

艺术精品，在于艺术人才：一度创作是剧本，二度创作是作曲，三度创作的核心是演员和服、化、道、声、光、电等各路人才，而导演则是统帅。剧中每一场伊始都有两句合唱的爬山调，是该场内容的提要；而结尾又都有“幕后歌”，则是这一场的点睛之笔。其中多次重复的唱词显然是在歌颂云岚这位母亲，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为抗战奉献一切的母亲，为子孙后代牺牲自己爱情和家庭的母亲。而扮演者范芝兰基础扎实、声如金铃、气息酣畅、音色恰如的唱功和扮演什么就做到“是什么”（而非“像什么”）的体验派创作能力，堪称一流。大喜大悲的感情、大惊大愕的反应、大起大落的环境，对她都是考验。舞台上每一个细节都被她精致的心理节奏把握到炉火纯青，实在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因而她承受得起——“大后山的女人命苦如黄连，不宽宽膀子硬撑一片天。”印证了——“亲妈妈，好妈妈 苦里跌倒难里爬。流着鲜血咬着牙，养活了革命撑起了家。”

如果说云岚属于“旦”行里的青衣，那么，第二位引人关注的就是“丑”行伪保长牛二拴。他知道云岚家亲共产党通八路军，也知道云岚母女正挣扎在饥饿线上。因而乘人之危，上门提亲。他说，只要山丹愿意嫁于富人做妾，要多少彩礼都可以。母亲坚决反对，女儿却爽快答应。山丹的选择为的是啥？

作为该剧女二号山丹的扮演者王亚苏，不仅唱功好，形体能力更是一流的。她边唱边舞边毫不掩饰地开始要彩礼：“我不要银元与金币/我只要莜麦和小米/我不要玛瑙和碧玉/我只要布匹和鞋底/我只要骏马

不要驴/要挑选蒙古马一百匹/为给咱军队解危机/女儿我甘愿牺牲我自己。”

虽然山丹的选择只停留在强烈的意愿时，就被“贵人”解了难，但不分男女老幼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众志成城的民心，却可见一斑。

第五场，当“大山水刮不断芦苇根，小鬼子吓不倒革命人”的歌声响起，观众预感，女主人公云岚一定面临生与死的选择了。果然，一帮鬼子在保长带领下直闯抗日“堡垒户”，逼着云岚交出养伤的八路军战士高小川。但云岚的选择，毫无悬念的是宁死不屈。孰料，就在气急败坏的鬼子要枪毙云岚时，保长却慌不迭地上去阻拦：“不要、不要，我看，还是活埋哇。”一贯欺世盗名的伪保长，竟然替云岚选择死的方式，这个人物的表演是复杂的——坏人的坏，难道是没有坏透仍有同胞的怜悯？还是他垂涎年轻山丹的美貌，惺惺作态而别有他图？表演者潜意识的瞬间反应，增加了人物塑造的复杂真实性，更加深了观众的思考。

“山丹丹开花六瓣瓣红，爬山调唱出咱军民情”，一曲传统爬山调《割莜麦》的旋律被新赋予令人振奋的词汇，通过小川和山丹的对唱，呈现出抗日游击根据地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政治氛围。然而，剧情跌宕起伏，绝艳之后就是暴风骤雨。

小川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怎么办？谁去救小川？怎么救？能救得出来吗？

剧情并不复杂，人性却并不简单。就在观众通过抗日游击队员和“堡垒户”，与给鬼子当狗的伪保长，进行好人与坏蛋的政治判断时，一个关乎伦理道德的深切思考，印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律：一个人的德行，是政治立场的基础；而正确的政治立场，又能促进美德的践行。因此，把抗击日本侵略者

